

张启成 著

诗经

研究史论稿

SHIJINGYANJIOUSHILUNGAO

- 先秦诗经研究概况
- 两汉诗经研究概况
- 魏晋至唐诗经研究概况
- 宋至明清诗经研究概况
- 近代至当代诗经研究概况

诗经

研究史论稿

张启成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研究史论稿/张启成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2

ISBN 7 - 221 - 05725 - 7

I. 诗... II. 张... III. 诗经 - 文学研究
IV. 1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740 号

诗经研究史论稿

张启成 著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熊 峰
版式设计	祖 铭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9.625
印 数	1 ~ 1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21 - 05725 - 7/ I · 1295
定 价	20.00 元

贵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运熙

张启成同志的《诗经研究史论稿》，在近二十年来有关《诗经》的研究著作中，是一部功力颇深、饶有新见的著作。

该书把诗经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即：先秦的诗经研究，两汉的诗经研究，魏晋至唐的诗经研究，宋至明清的诗经研究，近代至当代的诗经研究。并对这五个历史时期的诗经研究，作了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把自己研究成果二十多篇论文，按时间为序，分别置于五个历史分期之中，分别论述各历史阶段的诗经研究的重要观念与重要著作，从《诗经》作者的诗歌观到现代学者闻一多的看法，各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合起来构成了一部颇有系统的诗经研究史。

本书中的不少篇章，均能够仔细研析原始材料，钩稽排比，分析综合，提出深入独到的看法。如对汉代焦延寿的《易林》，著者指出其书涉及《诗经》篇章约有 60 余篇，至少占《诗经》篇数的 1/5，值得重视的是焦氏阐述诗义，基本上是就诗论诗，比较接近《诗经》原意，不像当时三家诗、《毛诗》那样多牵强附会之说。还指出后来宋儒如朱熹探求《诗经》源意的

工作,焦氏已经开始了(见《焦氏〈易林〉与〈诗经〉》篇)。这一论述对诗经研究史的源流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又如对孔颖达《毛诗正义》一书,著者用力甚勤,对该书的成书由来、体例、阐释方式等均有具体解说,经过仔细考察和归纳,著者指出《孔疏》在阐述上具有四个特点,各举例说明,内容翔实而具有说服力。之后又分析指出《孔疏》在论述孔子删诗、三颂体制差异、六义、《诗经》句式与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等问题方面,均援据充实,考辨精审。(见《论〈毛诗正义〉与诗经学》篇)这些都是经过对孔疏细致深入的考察后作出的精当论述。

著者注意诗经研究的不铜方法与方式,诸如经学研究、非经学研究、文学研究、综合研究、套式研究等等。本书对非经学研究、文学研究方面用力较多,发掘的材料与新见也更令人瞩目。除上面提到的关于焦延寿、孔颖达的有关论述外,其他如《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一文,从典籍记载、诗人创作、文学评论等各方面的材料入手,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如何从文学角度来欣赏理解《诗经》的艺术形式之美、诗的抒情内容、对后世文体的影响等,也是一篇材料丰富、饶有新意的论文。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和片段论述十分繁多,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字词章句的训诂笺释方面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学角度进行论述的,表现了论述者的文学观,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这笔遗产过去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清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发掘与论述,这不但对诗经研究史是一个新贡献,而且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不

少裨益。

启成同志原先研究《诗经》本身,对一部分国风、《商颂》、《鲁颂》等深入钻研,并发表了若干相当精彩的论文。由于他对《诗经》本身熟悉,现在转而研究诗经研究史,基础好,就容易看出问题。他曾说:“只有对古今中外的诗经研究有较为全面的理解,才能真正做到从宏观上把握诗经研究。”这话说得很好,道出了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我想,文学研究史要以文学史为基础,但它反过来又会促进、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中国古代一部分杰出的文学专书,像《诗经》、《楚辞》、《文选》、陶诗、《文心雕龙》、杜诗以至《红楼梦》等等,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清理总结这部分研究成果,是深化文学史研究(包括各种专家、专书、专题研究史)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当前学术界已有一部分学者都注意及此,并已有少数专著问世,这是令人高兴的。相信启成同志这本《诗经研究史论稿》的出版,必将对《诗经》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8年9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王运熙(1)
第一章 先秦诗经研究概况	(1)
一、《诗经》作者的诗歌观及其影响	(8)
二、《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	(16)
三、论孔子的诗学观及其渊源	(28)
四、孟子、荀子的诗经观	(39)
第二章 两汉诗经研究概况	(51)
一、焦氏《易林》与《诗经》	(57)
二、班固诗经观新探	(67)
三、论《毛诗》与三家诗的异同	(82)
四、论《诗经》三家诗的异同及其流变	(89)
五、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	(100)

第三章 魏晋至唐代诗经研究概况	(113)
一、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	(118)
二、《文心雕龙》的诗学观	(134)
三、论《毛诗正义》与诗经学	(146)
四、成伯玕《毛诗指说》新探	(161)
第四章 宋至明清诗经研究概况	(170)
一、论欧阳修《诗本义》的创新精神	(176)
二、论朱熹《诗集传》	(188)
三、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201)
四、评方玉润的《诗经原始》	(213)
五、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223)
第五章 近代至当代诗经研究概况	(235)
一、论闻一多《诗经》性文化研究	(241)
二、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	(255)
三、《诗经》与《雅歌》的比较	(268)
附 录 《诗经》逸诗考	(282)
后 记	(300)

第一章

先秦诗经研究概况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战国后期被列为经典著作。但《诗经》在春秋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对《诗经》的风、雅、颂做了一番评论，他认为《诗经》是反映各国政治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嗣后，孔子又评论《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无邪。”（《论语·为政》）《贾子·道术篇》：“方直不曲为之正，反正为邪。”朱熹《集注》引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所以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诗经》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真诚的心声。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诗经》在春秋时代事实上已被尊奉为经典著作，《诗经》的崇高地位及其权威性是社会的人们一致公认的。其二，在文、史、哲不分的先秦时代，《诗经》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多功能的共同体。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诗三百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诗歌总集，而是一部以政治、道

德为主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英国学者克·考威尔,在其《幻觉与现实》的首章《诗歌的诞生》中说:“在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学艺术中,我们看不到诗歌作为一种单独作品而存在。那是因为,当时它是同整个文学不可分的,是作为历史、宗教、魔术甚至法律所共有的表达工具的。”这一点很重要,先秦学者研究《诗经》,都偏重于社会政治或道德义理的发挥,并非是出于有意识的对诗歌本义的扭曲,乃是那独特的时代风气所导致的。

《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一段文字,很典型地表达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政治标准评价音乐诗歌的观点。

季札就是以政治标准为主来评价《诗经》的。兹举两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评论《诗经》的《周南》、《召南》说:“美矣!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也。”此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诗经》的首篇《周南·关雎》本是一篇君子追求淑女的婚歌,其中既有“求之不得”缠绵悱恻的哀怨,也有钟鼓迎娶喜得淑女的欢乐,感情色彩的对比非常强烈。但因为是“治世之音”,所以孔子对《关雎》一诗的评价强调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见《论语·八佾》)。

《诗经》的《郑风》本以美妙的情歌而著称,但在季札的时代郑国已有衰落的迹象。所以季札对《郑风》的评价是:“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这显然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翻版。

因为《郑风》是“亡国之音”而又具有美妙动听的特点，所以孔子一贯声讨“郑声”。他主张“放郑声，远佞人”，因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以政治、道德标准为主评价《诗经》的乐诗，这就是先秦春秋时期诗经研究的特点之一。

季札观乐，对国风、小雅、大雅、三颂的评价，最推崇的是颂诗，其次是大雅，再次是小雅，最后为风诗。这种排列的程序，对先秦与后世的诗经评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明显莫过于荀子与刘勰。

又季札观乐对诗经的评价，其风诗排列的程序与今本诗经（即《毛诗》）大体略同。而季札观乐时孔子才8岁。这事实业已表明早在孔子之前，已有《诗经》的定本，《诗经》非孔子所编定。

《诗经》在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社会交流的功能。《诗经》在当时是各国外交使节与外访君臣必不可少的宝典，当君臣使节在朝廷宴享之时，雍容揖让，赋诗言志，已成为普遍流行的风尚。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滞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春秋时期人们的赋诗言志，常常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借以表述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可见在那个时代，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各取所求乃是通例。这种断章

取义赋诗言志的方法,其特点是扩展或转移原诗的含义。但诚如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所说的那样,“‘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而“转移”也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事实上已改变了《诗经》原诗的本义,而把《诗经》纳入符号学的范畴了,凡赋诗断章的引用的一些诗句,都变成了新的信息与符号。如《小雅·四牡》首章:“四牡骅骝,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本是服役官吏自叹国事辛劳而思念家乡之诗。但赋诗言志时,却可以断章取义地取其辛劳这一点,从而变成了对使臣辛劳的慰问。所以据《国语·鲁语》和《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晋悼公宴请鲁国的使臣穆叔时,叫乐工歌唱了《四牡》,而穆叔说:“《四牡》君之所以彰(表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这样《小雅·四牡》便不再是使臣自叹辛劳思归之诗,而成为一篇慰问使臣辛劳的礼仪性乐歌,成为一个新的信息与符号。

《毛诗·小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虽有《国语》、《左传》的依据,却是赋诗断章信息之误传。

由于《诗经》在春秋时期具有社会交流的特殊功能,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诗经》既是义理的府库,又是交接邻国相互沟通的必备手段,因而《诗经》成为当时贵族子弟的必修课。《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经过诗教、礼教、乐教系统教育的人,才能成标准的君子。《周礼·春官》

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古代唱诗配乐而歌,因而“乐语”就是指配乐的歌词——诗歌。“兴、道、讽、诵、言、语”,是指运用乐语表情达意的各种不同方式。“国子”(贵族子弟)只有通过大司乐有关乐语的正确传授和严格训练,才能有效地掌握《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严格要求本阶级的子弟学习《诗经》,而且也鼓励平民百姓学习《诗经》。《管子·山权数》就曾说:“《诗》者所以记物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因而上自天子、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平民,在那个时代都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诗经》的。

由于赋诗言志或引用《诗经》是时代的风尚,所以先秦时期的史书与诸子都有大量引用《诗经》的例证。仅以《左传》为例统计,在春秋 240 年间,各种人物引证《诗经》(含《诗经》逸诗)就多达 230 多次,而在孔子 20 岁以前,引证的有 207 次之多。《诗经》引证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书》、《易》、《礼》、《乐》。这因为不仅《诗经》具有崇高的地位与权威性,而且还是其实用的社会交流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季氏》)兴,孔安国说是“引譬连类”、朱熹说是“感发意志”。观,郑玄说是“观风俗之盛衰”,班固说是“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群,孔安国说是“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国说是“怨刺上政”。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可以判断,先秦时期的人们对《诗经》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道德义理、修身养性的角度着眼的,主要是从《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着眼的,而并不注意《诗经》本义及其形式特点的研究。这种《诗经》研究的

角度,对两汉的《诗经》研究: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从先秦时期的背景与风气来看,这种诗经研究的视角是必然的,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负面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在季札之前,最早对诗歌功能提出见解的《诗经》时代的诗人,如《魏风·葛屨》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大雅·民劳》的:“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怨刺与讽谏是诗歌的重要功能。《诗经》的三颂、大雅及部分小雅与风诗,也有不少颂美之诗。因此在《诗经》时代的诗人,怨刺与颂美是诗歌的主要功能。怨刺是对恶的抗争,颂美是对善的褒扬。这种善、恶分明的诗歌观,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汉儒毛、鲁、齐、韩的不同学术流派,在评价《诗经》诗篇时,都偏重“美刺”,即是明证。

孔子的诗学观,强调的是《诗经》的伦理、道德的政治功能,对《诗经》向经学化方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但孔子的诗学观,大都是对人与社会行为看法的总结,如“《诗》可以怨”,取自《诗经》诗人的看法,“《诗》可以观”,取自季札观乐的看法,“兴于诗,立于乐,成于乐”之类,都是春秋时期教育王室贵族子弟通常的教育手段。但孔子加以系统与规范化了,可以说是春秋时期诗学观的全面总结。

孟子的诗学观,开始突破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的随意解释的惯例,而逐渐走向严密化,其主要标志,就是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前者强调认识作品必须注意客观、性准确性,后者强调必须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才能正

确地认识诗人的作品。这两点准则对后世颇有影响。孟子虽然在具体评析《诗经》作品时未能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正确评析《诗经》作品的例证确实要更多一些。

荀子的诗经观,重视三颂与大雅,小雅次之,风诗更次之,这是受季札观乐的影响,把《诗经》列为经学。荀子也有明确的表述。但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开始指责国风有“好色”的倾向,只是由于礼教的作用,而不至于达到过分的程度;又从“法后王”的观点出发,指出《诗经》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已有“故而不切”不适合时代的缺陷,体现了荀子儒、法并重的独特诗学观。

自西周初年到东周前期,是《诗经》产生和成集的时期,自春秋到战国,是《诗经》广泛流传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一批精通《诗经》的著名学者,如季札、孔子、子夏、孟子、荀子以及《国语》、《左传》的作者。虽然他们的见解先秦古籍中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很难说是系统的诗经研究,但毕竟是开了一代诗经研究的风气,并为较为系统的两汉的诗经研究奠定了基础,因而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此外,先秦典籍中保存了不少《诗经》的逸诗,对我们全面了解《诗经》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下面通过四篇专题论文,对先秦的诗经研究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诗经》作者的诗歌观及其影响

《诗经》的国风、小雅和大雅的部分作者，都自发地表述了对诗歌的功能与作用的想法，虽然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因为这些见解，不仅资料真实可靠，而且时代久远，多数属于西周时期，少数属于东周前期。这种初期形态的诗论，其出现并非偶然。卫姆塞特·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第一章就曾说：“自始以来的诗人，多喜爱谈论自己的作品，把文学见解写入自己的诗篇。所以，人类自有了诗歌，雏形的文学理论便相偕出现。荷马在他的史诗卷首，向缪斯女神呼求灵感。这种行为便暗示一种诗的创作理论——即是诗篇的形成乃是‘神赐灵感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诗经》的一些作者却很现实，他们的诗歌观大都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实感而发，体现了东方古代诗人的务实精神。兹分类列举如下，并稍加诠释：

(一) 讥 刺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屣》）

按：褊心，指心胸狭窄。此诗朱熹认为：“疑即缝裳之女所作。”至于缝裳女的身份与讽刺的对象，或认为是侍妾讽刺

正妻之偏心，或以为是缝衣女奴讽刺贵族妇女的诗。两说均通。

夫也不良，歌以讥之。（《陈风·墓门》）

《毛诗序》：“刺陈陀也。”据《左传·鲁桓公五年》载：陈陀为陈桓公弟，因杀太子免自立，导致陈国内乱。《说文》：“讥，数谏也。”段玉裁注：“谓数其失而谏之，凡讥刺字当用此。”按：鲁桓公五年为公元前707前，此诗当作于此时。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毛诗序》：“苏公刺暴公也。”今人或以为这是一首女子讥刺负心汉的诗。意谓：制作这首构思精美的诗歌，以揭穿这个反复无常的人。极，穷也；究也。这里引申为揭穿。

（二）怨 愤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跼。

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小雅·正月》）

程俊英《诗经译注》译为：“是谁说那天很高？走路不敢不弯腰。是谁说那地很厚？走路不敢不蹑脚。人们喊出这些话，确有道理说得好。”按：这是一位士大夫官员的作品，因有感于“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而作此诗，以强烈显示作者在